

中國男性經歷了什麼性別的轉變？而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道路，傳統的『英雄』及『好漢』形象，如何幫助重新發現不同形態的『男性氣概』？」(Martin W. Huang, *Negotiating Masculinit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6, p. 203)。黃說甚是。其實，哪些「男性氣概」的特點在不同階段也是共有的？哪些特點是有異於帝制時期的？而男性成為軍人，常到戰場殺敵及接受嚴格的軍訓，是否理所當然地能維持「男性氣概」？若果民國時期的男子不能從軍，又有否其他途徑表現自己的「男子氣概」？再者，我們不能否認男性在社會處於主導角色，但男性對於女性在戰爭的輔助角色的理解，又有沒有滲入男性本位的認知？身為國民的男性是需要堅持男性至上的原則，還是會因社會環境、思想的改動，而對女性角色的看法有所轉變？此外，軍人的家族傳承中，又可有長輩對後輩的訓誡文獻，可供窺探他們對「男性氣概」的堅持？軍人社群中的人際關係，也可以有所着墨。以上皆為筆者一些方向性的建議。

總括而言，王詩穎這部新著是有貢獻的。全書採取男性研究的角度，以性別鏡子來分析軍事，為近現代中國戰爭的歷史提出了重要的詮釋。同時，也證明了「男性氣概」的研究極具延伸討論的價值，可以為現存的「性別研究」帶來新視野及衝擊。

何宇軒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

李君山，《全面抗戰前的中日關係（1931-1936）》，臺北：文津出版社，2010年，530頁。

近年來，隨着蔣介石日記的公開，臺北國史館的《蔣中正總統檔案》亦愈加受到學人重視。利用蔣檔和蔣介石日記進行民國史研究成為一股熱潮。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李君山於2010年出版的《全面抗戰前的中日關係（1931-1936）》便是在充分利用蔣檔的基礎上著成的研究成果之一。

關於全面抗戰前的中日關係，涉及到中日兩國的內政和外交，可從政治、軍事、派系鬥爭、人脈關係、經濟互動以及條約協議的交涉等各方面展開探討。中日兩國學者對此課題的研究成果不勝枚舉。日本學者多針對日方因素，在日本對華政策上的研究頗下功夫。而中國方面，大陸和臺灣學者的

研究成果有很大差異。早年大陸學者對此時段中日關係的研究主要是在「中國現代革命史」、「日本侵華史」的框架下書寫（余子道，《長城風雲錄——從榆關事變到七七抗戰》，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3，「前言」，頁1），對七七事變以前國民政府的具體外交政策關注較少。但20世紀90年代後，大陸學者亦開始注意運用以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為首的國民黨檔案文獻，從南京政府的角度出發探討其對日政策。相對於大陸學者而言，臺灣學者的研究成果更為豐富、成熟。在李君山的著作以前，較為重要的研究成果有劉維開的《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從九一八到七七》（臺北：國史館，1995）、周美華的《中國抗日政策的形成——從九一八到七七》（臺北：國史館，2000）。周書是在「大溪檔案」開放後最早利用蔣檔進行全面抗戰前國民政府政策研究的著作，其翔實、公允的論述得到學界的廣泛認同。在此基礎上，李君山的《全面抗戰前的中日關係（1931-1936）》對蔣檔的利用及中日關係的探討，亦有不少新的貢獻。

《全面抗戰前的中日關係（1931-1936）》主要探討的是國民政府對日政策的具體形成過程，著者按國民政府的對日政策發展，將1931-1936這五年分為三個階段，即九一八至一二八的「政策空窗期」；一二八至「河北事件」（1935年5月）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時期；以及「河北事變」至「七七事變」的「備戰時期」。然而此書對中日關係的探討又不限於此五年，而是從1928年濟南事變和1929年中東路問題開始探討「不抵抗」政策的淵源（第一章），由此再論述九一八到一二八時期國民政府對「不抵抗」政策的延續以及在此之上的各種應變和轉變（第二、三章）。其後此書探討了華北危機的加深，並關注蔣介石以及南京和平派、華北兩會的相互牽動，國民政府的對日政策亦愈加複雜，形成了抵抗和交涉交錯發展的局面（第四、五、六、七章）。著者還專門探討了「兩會體制」，即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及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的籌畫和組成（第五章），以及在兩會作用下關內外通車、通郵的交涉（第六章）。而1935年的河北事件和張北事件以後，兩會體制愈加鬆動，其對華北局勢的影響作用亦開始淡化（第七章）。需要指出，此部份對黃郛及兩會體制的論述尤為詳細，對於黃郛在中日關係上的作用，亦作出了充分闡釋，可謂此書重要貢獻之一。其後著者探討了華北軍系的失衡以及華北自治運動、冀察政務委員會的出現，這揭露了華北危機的進一步深化，由此蔣介石的對日政策亦開始明顯硬化（第八章）。隨着蔣介石逐步走向前臺，且以汪精衛為首的和平派在對日交涉中的各種受挫（第九章），國民政府的備戰情緒便愈加高漲，蔣介石指導下的中日國交調整談判也充分

體現了其強硬態度（第十章），這為隨後的西安事變和全面抗戰提供了發展的可能。

全書以條理清晰的十章節論述了複雜多變的政策演變及其後所暗藏的人脈關係。這得益於著者對大量檔案史料的梳理和運用。此書雖名為「全面抗戰前的中日關係」，但著者所運用的史料卻不限於外交文書，而是充分利用與內政相關的各種文獻，尤其關注南京政府和地方實力派之間的互動往來，這使各派系、各組織之間的關係得到了細緻梳理。由於蔣檔中保存了大量重要人物（如張學良、汪精衛、黃郛、張群、宋哲元等人）與蔣介石的往來電文，另有各方遞呈予蔣的情報檔案。著者以這些重要資料為基礎，結合臺灣出版的《革命文獻》、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民國檔案》等資料，再參考各重要人物的文集、日記和回憶錄，使此書獲得了各層面的史料支撐。以往的研究論著中或有只見各組織機構在運作，不見具體人物實際操作的缺點。但此書卻能注意到各當權者和地方實力派頭目之間的複雜網絡，並強調其不可忽視的影響力。以這種角度探討「中日外交」可謂是著者有意識的偏重——此書對中日雙方外交互動的探討實際上是次要的，而主要在論述「外交」政策制定的過程中隱含於其後的「內交」，即蔣介石與國民黨各派勢力之間的權衡與鬥爭。著者認為需要分析中國內部各方之間的聯繫和衝突，以及南京政府與地方勢力在對日交涉實權上的此消彼長，把握內政／外交、中央／地方、派系／人事、政策／執行這幾對問題的關係（頁512），才能了解中日關係的真實一面。

著者在行文的過程中大量引用以蔣檔為主的檔案資料，很少直抒自己的主觀意見，使全書盡量做到用事實說話，較少空談。但章節安排以及具體論述的過程中，還是能看出其對這五年間的中日關係有明晰的觀點和立場。

20世紀90年代以前，大陸在七七事變以前的中日關係研究中多強調日本對滿洲、華北採取各種政治、經濟、軍事上的侵略，並對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採取的「不抵抗」、「攘外必先安內」等舉措給予負面評價。近年來，已有不少大陸學者對這種定性已久的評價提出質疑，對於七七事變以前的歷史亦提倡作出更為客觀公允的實證研究。與此同時，臺灣學者的研究成果亦愈加引起大陸學人的關注。由於政治立場相異，臺灣學者在探討此段歷史時所採取的角度和態度有明顯異於大陸的特點。李氏一書雖沒有提出鮮明的政治立場，但其研究的角度、史料的運用及其反映的問題都值得大陸學者關注與反思。

首先，著者對「不抵抗」政策的探討追溯到北伐時期，指出當時的「革

命外交」使得國民黨「自己讓自己的標語麻醉了」（頁22），高調的民族主義情緒讓國府決策層忽視了「預防外交」的重要性。其後濟南事變和中東路問題，國民政府都採取「不交涉、不抵抗」的舉措，並過於依賴「國際均勢」。這種政策的「慣性」一直延續到九一八事變，而蔣介石和張學良亦已對不抵抗的政策達成了默契。由此著者認為九一八事變採取的不抵抗政策並非偶然，而是北伐以來外交政策的延續。以往只考慮事變爆發後蔣、張與日人之間的交涉和最終作出的決策，並指出此種決策的失誤，也許是忽略了這種連續性所帶來的影響。這種觀點或有值得進一步商榷之處，但著者所提出的問題是值得學人進一步思考的。

其次，關於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著者亦作出了詳細探討，並在論述的過程中體現了其對蔣介石持有同情之態度。20世紀30年代蔣介石所致力的「安內」不僅在於「剿共」，還在於處理國民黨各派系之間的鬥爭與制衡。著者對後者的論述頗為詳細。張學良、閻錫山、宋哲元、馮玉祥等地方實力派以及汪精衛、黃郛、張群、何應欽等在內政和外交上舉足輕重的人物，與蔣介石之間形成複雜的關係網絡，彼此間常現矛盾和分歧，且對日態度亦各執己見。蔡廷鍇、馮玉祥等一度持強硬的抗日態度，然而蔡廷鍇的「反蔣」為實、「抗日」則虛；馮玉祥等人的抗日同盟亦屬地方割據性質，部隊生存高於抗日大義的傾向都被著者一一指出（頁191）。此外，以土肥原賢二為首的「中國通」利用中國內部各黨派之間的矛盾，對其間關係不無挑撥，亦使蔣介石「安內」的計劃步履維艱。由此不難理解，在這樣的情勢下，實難統一國內聲音，一致「攘外」。正如著者所言，在分析和制定對日「外交」政策之前，釐清國民黨的「內交」更為重要。1935年蔣介石對日政策開始硬化，其「抵抗」和「攘外」的一面愈加突出，對此，著者指出蔣、汪之間的分裂以及南京和平派的失利，是蔣介石作出這種轉變的重要契機，這亦是作者對「內交」之重要作用的進一步強調。

總體而言，著者充分發揮了臺灣學人的優勢，從蔣檔所提供的信息中揭示了一系列重要的史實，並從中展示了不少值得大陸學者留意的觀點和角度。也許由於日文史料的有限和研究主題的限制，著者對日方因素的探討極為有限。而日本內部各方勢力的複雜關係，並不比國民政府的派系鬥爭簡單。著者若能對日方因素有所照顧，應能使此書所探討的「中日關係」更為全面和完善。

劉慶霖
北京大學歷史系